



《国语》研究

夏德靠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出版获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国语》研究

夏德靠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语》研究 / 夏德靠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30 - 2946 - 9

I. ①国… II. ①夏… III. ①中国历史 - 春秋时代 -
史籍②《国语》 - 研究 IV. ①K225.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9670 号

责任编辑: 罗 慧
封面设计: Sun 工作室

责任校对: 韩秀天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国语》研究
夏德靠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责任编辑: 010 - 82000860 转 8345	责编邮箱: luohui@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2946 - 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语”的传诵及作为教材	(9)
一、重言风尚	(11)
二、乐语传统与古史传述	(23)
三、“语”作为教材	(52)
第二章 《国语》与《左传》	(61)
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63)
二、“《春秋》外传”的由来	(71)
三、《国语》与《左传》文本之比较	(86)
第三章 《国语》的编纂（上）	(103)
一、“国语”与“家语”文献	(105)
二、“八语”的遴选	(122)
三、从穆王征犬戎到智伯之诛	(136)
四、正例与变例	(146)
第四章 《国语》的编纂（下）	(165)
一、规谏与咨政话语	(167)
二、“三段式”与“君子曰”	(181)
三、“事语”体	(198)
第五章 《国语》的礼制世界	(215)
一、“五服制”与天下图式	(220)

二、同姓不婚与共王灭密	(231)
三、重农传统与藉礼仪式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77)

绪 论

长期以来，比起其他的先秦文献来说，《国语》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这种状况固然难免使其研究者感慨，但它是事实。《国语》的研究进程，大致有三个研究的高潮：一是汉晋时期，二是有清一代，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本书先来回顾《国语》研究的过程。

宋庠《国语补音叙录》指出：

当汉世，《左传》秘而未行，又不立于学官，故此书亦弗显，唯上贤达识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识也。逮东汉，《左传》渐布，名儒始悟向来《公》、《谷》肤近之说，而多归《左氏》。及杜元凯精研训诂，木铎天下，古今真谬之学一旦冰释，虽《国语》亦从而大行，盖其书并出丘明。自魏、晋以后，书录所题，皆曰《春秋外传国语》，是则《左传》为内，《国语》为外，二书相副，以成大业。……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注释，为六经流亚，非复诸子之伦。自余名儒硕生好是学者不可胜纪。历世离乱，经籍亡逸，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于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国语》二篇，摭摭意外微细以为诋訾，然未足掩其洪美。……先儒未有为《国语》音者，盖《外》、《内传》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传《旧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寻其说，乃唐人也。……然其音简陋，不足名书，但其间时出异闻，义均鸡肋。庠因暇辄记其所阙，不觉盈篇。今因旧本而广之，凡成三卷。^①

这段序文简要概述了自汉至宋庠所处之时代即北宋这一时段《国语》

①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6~597页。

的研究情况,《国语补音叙录》可视为简练的“《国语》学史”。^①通过宋庠的叙述,可以对这个时段的《国语》研究之特征进行如下归纳:

其一,按照宋庠的说法,《国语》之所以被重视,主要基于《左传》的渐布,这揭示了《国语》研究的依附性质。事实上,《国语》的很多问题是与《左传》纠缠在一起的,单独研究《国语》而不涉及《左传》的情形几乎很少出现。

其二,汉、晋学者虽然对《国语》进行章句、注释的工作,但只有屈指可数的六家,这六家到宋庠的时代只有韦《注》一家完整存留。

其三,宋庠提到唐代学者柳宗元所撰写的《非〈国语〉》,但给予的评价并不高。其实,柳著在《国语》研究史上是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献,据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在柳宗元之后,存在江端礼的《非〈非国语〉》、戴仔《〈非国语〉辨》、刘章《非〈非国语〉》、虞槃《非〈非国语〉》、叶真《是〈国语〉》、曾于乾《非〈非国语〉》^②这些回应性的研究。柳著针对《国语》的内容、思想进行考察,《非〈国语〉序》云:“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③这个看法柳氏还在其他地方提及,《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

① 这只是出于一种权宜的说法。尽管宋庠在《国语补音叙录》中对《国语》研究的进展进行描述,但他毕竟不是有意识回顾这段历史,而且他的工作也没有要求这样做,因此,有些涉及《国语》研究的环节并没有入他的视野。比如,“汉代是《国语》学的发端期。在这个时期,对《国语》作者的研究、对《国语》文献的整理考订、对《国语》的训诂考释、对《国语》的史学研究,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对后世《国语》学发生了深远影响”。见陈鹏程:“汉代《国语》学概述——《国语》学史研究之一”,载《兰台世界》2009年12月下旬刊。

② 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74页。另《经义考》著录有林概的《辨〈国语〉》、张邦奇的《释〈国语〉》。

③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98页。

其不减，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①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尝难言于世俗。……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②柳氏在这些地方反复揭明撰《非〈国语〉》之苦心，亦即从儒家之道出发，批判《国语》离经叛道的做法，《非〈国语〉》可以说是较早而较全面接触《国语》的内容与思想的研究。

其四，宋庠叙述自己撰作《补音》的缘由，是因不满唐人的《旧音》之作，平时注重这方面的研究，最终积累成三卷《国语补音》。这是继韦昭《国语解》之后的又一《国语》研究的重要文献。至于鲁有开所撰的《国语音义》已佚，难以对其进行考察。

宋庠之后，下逮清初，虽然“研究《国语》者寥寥无几”^③，但据《经义考》的载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类编现象，如张九成《标注国语类编》、吕祖谦《左氏国语类编》；二是地名、人名的考察，如刘城《春秋外传国语地名录》《春秋外传国语人名录》。到了清代，《国语》研究出现第二次高潮，俞志慧博士对此有较详细的梳理。^④“他们校诂研究成果的表现途径大致有二：一为专书，二为学术札记、笔记”^⑤，如王懋竑《读书记疑》、汪中《经义知新记》、姚鼐《国语补注》、刘台拱《国语补校》、黄丕烈《国语札记》、王引之《经义述闻》、黄模《国语补韦》、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陈瑒《国语翼解》、董增龄《国语正义》、俞樾《群经平议》、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于鬯《香草校书》、

①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337页。

②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338页。

③ 戎辉兵：“《国语》流布、研究及版本概述”，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④ 俞志慧：《〈国语〉韦昭注辨正·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页。

⑤ 戎辉兵：“《国语》流布、研究及版本概述”，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王仁俊《经籍佚文》等。对有清一代《国语》研究的特点，王树民先生说：“清代学者校注《国语》者甚多，大致可分为二类：一为全刊《国语》本文及韦《解》更加附注者，为补注性质，另一种则仅摘列《国语》及韦《解》有关文句加以校勘诠释，而以后者为多。”^①因此，清人对《国语》的研究除了继续沿袭传统注解这一著述形式之外，存在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其一，对韦昭《注》进行补正；其二，对《国语》本文及古注进行辑佚工作，比如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序》就提及辑佚的过程：“三君者，后汉侍中贾君逵、吴侍御史虞君翻、吴尚书仆射唐君固也。韦宏嗣采摭三君，并参己意，成《国语解》二十一卷。汉章帝时，郑大司农众作章句，其书最为近古，久亡其篇数。魏中领军王肃、晋五经博士孔晁亦为章句训注，后先于韦而《解》不载。今远孙不揣鄙陋，搜罗旧闻，其三君说有见于《解》中有不见于《解》中悉录之，王、孔诸家亦载焉。于以识韦氏作《解》之去就、而众说之足资取益也。称三君者，仍宏嗣之本书也。”^②从《国语》的研究过程来看，应该说清人的这些工作是很有实绩的，也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国语》后续研究的坚实基础。

民国时期的《国语》研究，大体沿承此前的学术传统，如金其源《读书管见·国语》、沈镛《国语详注》、徐元诰《国语集解》。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徐著，王树民先生指出：“徐元诰之《国语集解》行世最晚，而能网罗各家之说，取补注形式，较其前各书为加详。”^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语》研究掀起新的热潮，几十年来除涌现一批选本、注释本、全译本之外，还在诸多领域展开对《国语》的研究。郭万青先生梳理 1958 ~ 2012 年的研究情况，并具体概述为如此几个方面：“（一）《国语》与相关典籍的比较或综合研究；（二）《国语》版本研究；（三）《国语》校理与传统训诂研究；（四）《国语》语言研究；（五）《国

①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前言》，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 页。

② 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清道光丙午振绮堂刊本。

③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前言》，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 页。

语》思想研究；（六）《国语》制度或社会文化研究；（七）《国语》文学研究；（八）《国语》引相关典籍与相关典籍引《国语》研究；（九）《国语》作者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①从这个梳理，不难想见其研究的热情及广度。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学术自身发展的原因外，还与新材料的发现有关。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这类发现，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②据统计，上博楚简中约有20种古书和《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大量语类文献的出土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先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国语》这一语类文献的范本自然会更加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本书在借鉴前哲时贤成果与观点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国语》文本的生成状况，亦即关注《国语》文本运动的过程性研究。因此，从方法论的笑来看，本书主要从历史的、还原的笑出发，力图凸显《国语》这一个体文本生成的原生态图景，期望在时间视域下展示其运动轨迹。应该说，《国语》这部文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存在源于厚重的记言传统，也就是说，其文体渊源可回溯至五帝时代的“乞言”仪式。周代的“重德”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无疑使记言这一载录形式找到适宜的生存环境，同时，周代的分封制又催生一大批诸侯王国，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影响下，记言文献不但存在于周王朝，也普及于各诸侯王国。这样，不难想象那个时代记言文献的丰富性，而正是这些丰富的记言文献构成后来《国语》编纂的源文献。当然，这些记言文献只是《国语》文本生成的前提条件，《国语》这一独特文本的最终完成还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寻找这些力量无疑是一件极其费力而困难的事情，但这也是本书力图达成的重要目标。因此，本书通过对这些力量的还原而力图多层次地描绘《国语》编纂

① 郭万青：“1958年以来的《国语研究概览》”，载《知识管理论坛》2013年第8期。

② 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3页。

过程的复杂性。当然，著者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工作面临难以躲避的风险，因为在何种程度上恢复周代的生活图景毕竟不是著者的主观愿望所能实现的，它的构建需要太多的元素。因此，著者的这一工作只能视为一种尝试。

第一章 “语”的传诵及作为教材

目前所能看到的先秦传世文献中，《国语》《论语》是直接以“语”命名的两部文献。它们何以将“语”作为书名，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当然，历来在讨论《国语》《论语》时会对“语”加以注解，但这种注解多半是就“语”的词义作出的，很少从文体，乃至文化的笑对其予以解说。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学界逐渐意识到“语”是先秦时期重要的一种文类，李零先生曾经指出：“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只是其中的两种，其他材料还未发表）。如《左传》一类古书恐怕就是用这类材料编成，现在的《国语》、《国策》也是此类古书的子遗。早期史书，是以‘春秋’、‘世’为筋脉骨骼，‘语’、‘故志’、‘训典’为躯干血肉，这对后世有很大影响。”^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在讨论先秦“语”体的现象已经逐渐增多，对它的认识也慢慢丰富起来。在这里，本章着重分析“语”在先秦时期盛行的原因，进而把握它的用途及其流传。

一、重言风尚

在先秦时期，人们似乎对言语现象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可以说那个时代业已形成重言的风尚。人们不但重视言语，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有意义的言论对于实践所发挥的指导作用。在此，先来分析先秦社会的“乞言”制度。

《礼记·内则》有这样一段记载：“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

^① 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2页。

亦微其礼，皆有悼史。”^① 依据这里的说法，有这样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五帝三王时期形成一种养老礼，二是在举行养老礼的过程中有“乞言”的环节，三是有一种称之为悼史的专门负责载录的职业。对于这三方面的内容，本书试着作一些分析，以期借助这种清理工作，来凸显或者还原那个时代重视言论的图景。

先秦文献中，有很多地方述及“养老”。《周礼·地官》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二曰养老”，郑《注》：“保息，谓安之使蕃息也。……养老，七十养于乡，五十异粮之属。”贾《疏》解释说：“上经既陈凶荒不安之事，故此经陈安养万民之道。云‘以保息六养万民’者，民不安即不得蕃息，安则蕃息。保，安也。民使蕃息有六条，以养万民，故云以保息六养万民也。”^② 从贾《疏》的解释来看，这条记载主要强调对老人的身体进行养护。《地官》还说“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贾《疏》云：“云‘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者，门谓十二国门，关谓十二关门，出入皆有税。所税得者，亦送帐多少，足国用之外，留之以养老孤。”^③ 这条记载说的是从物质上给养老提供保障。因此，《周礼》主要从物质、身体方面论述养老问题。《礼记》也有多处文字谈到养老，然而相比《周礼》，其涉及的范围要广阔，更具体地描述了养老礼的仪式诸环节。《王制》说：“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郑《注》指出：“兼用之，备阴阳也。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阳用春夏，阴用秋冬。天子诸侯养老同也。”^④ 此处提及虞、夏、商、周养老礼的仪节特征。《王制》还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

①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5页。

② 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③ 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④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